

二十世纪的 美国与中国

〔美〕迈克尔·谢勒著

徐 泽 荣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7822.371 1/2

二十世纪的 美国与中国

〔美〕迈克尔·谢勒著 徐泽荣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王师旗

Michael Schall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9
根据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
ERSHI SHIJI DE MEIGUO YU ZHONGGUO

〔美〕迈克尔·谢勒 著

徐泽荣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 9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8.75印张 127,000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1,500

书号11002·642 定价1.45元

DHS4/05

出版说明

美国史学工作者迈克尔·谢勒(曾译作沙勒)继《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之后,1979年又出版了我们现在译出的这本《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

谢勒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引用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探讨了1938—1945年间的美中关系,得到史学界的好评。

《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则是对美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以后的美中关系进行综合论述,是一位新一代美国史学工作者对近一个世纪来美中关系发展所作的概括。作者继承了美国老一辈资产阶级自由派学者的基本观点,对美中关系的不平坦道路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对近年来美中关系的发展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中译本对书中所引材料与《美国十字军在中国》有大段重复之处和其他一些地方,均作了适当的删节。

引 言

中国吸引美国已有两百年之久。尽管它是个遥远的世界，可是历代美国人均认为他们极了解中国人，或把他们当作朋友，或当作凶恶的敌人。中国象磁石一般，从太平洋彼岸地平线上吸引着外国人：军人策划攻城掠地，商贾梦想招财进宝，传教士则意在为基督教的救世事业传道布教。1949年以前，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中国，是一个任人宰割、榨取或令人怜悯的没落帝国。自从共产党的革命为中国重新赢得了独立和权力之后，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又成了不可饶恕的敌人。

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常常是混乱、矛盾的，显示出异乎寻常的政策多变。这反映出美国国家利益的内部激烈冲突和两国间相互了解的肤浅。此类事例极多：美国人派遣传教士去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却又参与毒害中国人的鸦片贸易；当修造铁路需要廉价劳动力的时候，美国人曾鼓励大批华工

迁美，可后来却又禁止亚洲人移民美国，因为亚洲人被视为劣等人种；美国人曾鼓励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可后来却支持和扶助一个独裁政府当权；美国人曾斥责中国共产党人是苏联人的傀儡，可后来却又同他们一起反对苏联在亚洲等地的扩张活动。

本书研究的是十九、二十两个世纪里美国同中国的关系，重点年代放在美国深深陷入亚洲事务并试图塑造中国命运的1937年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对待国共两党的政策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固定成型的，这一政策最终酿成了在朝鲜和越南发生的流血冲突。震惊中外的尼克松总统北京之行，使冷战在亚洲归于结束；如今，距此近十年之后，美中两国仍在继续锻造一种脱胎于敌对的过去的新关系。作者希望本书将有助于读者了解美中关系中业已克服和尚待克服的种种巨大障碍。^①

① 以下略去致谢名单。——译者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中国的形象	1
第二章 亚洲秩序混乱时期,1894—1936	30
第三章 从芦沟桥到珍珠港	63
第四章 中美同盟	94
第五章 美国面对中国革命,1942—1949	126
第六章 “红祸”与“黄祸”	173
第七章 美国、中国、越南混战,1950—1968	207
第八章 漫长的旅程:美中缓和	226
第九章 未了事项	260

第一章

中国的形象

1949年10月1日来自中国的消息，令美国人感到困惑不安。在位于北京古老紫禁城中央的天安门城楼上，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发表演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前此一周，毛和其他几位中国领导人，曾在名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临时议会里发表过演说；当毛宣告中国“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的时候，与会代表们欢声雷动。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残余给撵出了大陆，不仅如此，大批外国传教士、商人和军人也随同离去。毛已宣布过，新中国将支持苏联阵营，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连那些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变得有“文化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之嫌。

至1949年，对苏冷战已进行了将近四年，大多数美国人已习惯于将无论哪里发生的剧烈变动都看成是共产主义全球阴谋的一部分。甚至在毛正式宣告他的新政权成立之前，《纽约时报》就将毛的追随者们斥为了一股“令人作呕的势力”、一个“由莫斯科委任的人统治的、严密的寡头政治小集团”。在一份1949年8月发表的官方声明中，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奚落中国共产党人不过是俄国的傀儡，他们的政府甚至经不起第一次的合法性检验。“它不是，”艾奇逊说，“中国的。”前美军陆军参谋长、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后来作证时，竟然赞同某参议员的说法：“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苏俄对这个国家的一次征服……”依照《生活》杂志的看法，毛泽东“粉碎了许多美国人一度抱有的幻想，即中国共产党人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有所不同的这么一种幻想”。大多数美国人得出结论：中国已不知如何被丢失在铁幕——或竹幕——后面了。此后二十五年中，追查谁应负“丢失中国”责任的活动严重损害了美国的政治生活。这一追查，连同对政府和大学中许多中国问题专家的清洗，对美国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了了解美中关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湍流，我们必须回头看看前一时期的美中关系。1937年——即仅在毛登上天安门之前十二年——另一位中国统治者在美国受到大肆宣传。此时日本已入侵中国并有席卷中国之势。《时代》杂志宣布蒋介石委员长及其夫人为“本年度最佳伉俪”，因为他们对日本人进行了英勇——然而可能是无望——的抵抗。日本军队被描绘成一群蜂拥而来的“蚂蚁”，在原始征服欲的驱动下前进；而中国人民则正由“一位最高统帅及其卓越夫人”率领，在为捍卫西方文明的菁华而战。如果蒋得胜，《时代》杂志推测说，他就有可能成为“本世纪亚洲伟人”。美国在华一千五百名传教士中的许多人也作了类似的报道，宣称蒋及其夫人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上一对“最为开明、爱国和能干”的统治者。珍珠港事件后，美中结成联盟，此后，对蒋及其夫人的吹捧更有增无已。了解这些情况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美国人把蒋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看成是一件如此可怕的事件。不出十年，中国便从民主盟邦变成共产主义敌国——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于1949年的急剧转变，如果能联系这之前

一百五十年中的历史来看，就远不会感到如此吃惊了。从接触伊始起，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就存有误解，并表现出他们在文化、历史方面根本不同。双方均根据自己的规范和价值观念来理解美、善和进步。异己的就一定是低劣的。

作为西欧文化的一个分枝，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念强调对于个人主义、基督教和代议制政府的信仰。社会活动的重心保留在核心家庭之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鼓励私营经济在政府的支持、调节下发挥主动性，各种技术革新迅速得到接受，从而使美国转变为世界上几个主要都市型工业国家之一。尽管地区差别和种族差别严重，但自南北战争后，由于造就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美国得以享有史无前例的繁荣。不平等的现象虽然仍然存在，但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很快就在财富、权力两方面居于几乎无与伦比的地位。

而传统中国呈现出来的，却是一幅与近世美国极不相似的图画。远在耶稣诞生之前数千年，它的文化便相对独立地发展起来了。各地区在地理、气候和语言方面的巨大差异，削弱了社会的整体性。中国的生活是极度乡村型的。即令是今天，在经历了三十多年前所未有的工业增长之后，仍

然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是居住在农村的庄户农民。在美国，至今继续留在农村里的人恐怕只有百分之五。虽然与十八世纪的欧洲相比，传统中国的农业成就毫不逊色，但是，使西欧改变面貌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光顾中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政府的腐败、外国的冲击，所有这些，使那些耕种自己的土地或租赁小块土地的农民，背上了一付越来越沉重的担子。要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家糊口和交租纳税变得越来越困难。至二十世纪初，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在中国，“贫困、凌辱和夭亡便是将近五亿中国人民仅有的前途”。

统治传统中国的是一种稳固的政治制度。以世袭的皇帝为中心，权力成辐射状向下伸展到众多的省份。皇帝被认为是天的儿子——“天子”，他通过大批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吏实行统治。尽管从理论上说，人人都有资格充任这种官员，以及踏上这条由科举打开的升官发财之路，但是经济现实却使这种自由减至最低限度。这种考试，要求应试者在古典文学和文言文方面有过严格训练，而这又需要长年累月的自学。由数不清的组合构成的文言文不利于交际和学习。书面语的复

杂，使得大多数人不通文墨，并且加深了他们所受的压迫。文化成了一种剥削工具、一种上进的障碍，而不是一种启蒙媒介。

科举制度的这种先决条件，给乡村地主享有特权的子弟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这些乡村地主，或人们经常称作的“士绅”，垄断了大部分官职。在乡村型的中国，士绅阶级是文化、法律、道德、秩序和财产的卫士。无怪乎在地方政府官吏和他们的天然支持者——当地财主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互惠联盟。士绅经常承担起维持地方治安、收缴租税及维护和建造公共工程的责任。作为回报，地方官吏则为士绅据有的经济、社会特权提供官方认可。这种联盟为双方带来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安全。

证明这种划分有理的，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力主贤人统治的被称为儒家学说的社会哲学。儒家学说强调尊崇礼教，对上忠诚。这套理论提倡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男尊女卑；长幼有序；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士绅居上，农民在下。皇帝是整个家庭的首脑，有权要求人民象服从自己的父亲或祖父一样完全服从他的廷臣疆吏。无怪乎不论是士绅还是官吏，都把认可他们优越地

位的儒家经典奉为神圣。

朝廷和比较富裕的阶级确曾为兴建辉煌的建筑和创造艺术品提供过资助。但这些仅能被人口只占百分之二、三的人享受的奢侈品，是通过榨取农民一点一滴的生产剩余来造就的。持续不断的剥削，周期性地引起了大大小小的造反。有几次造反甚至成功地推翻了统治王朝。然而，这种统治阶级的改组极少触动根本秩序。由于没有发生由一套新的政治理想和意识形态促成的价值观念改革，得胜的农民领袖很快就照搬其前任的制度。

甚至外族征服者，如蒙古族人或建立了清王朝(1644—1912)^①的满族人，也很快地使自己适应了既存制度，并借助受过儒家学说训练的官吏和士绅来实行统治。只有在农民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得极为恶化，并且恰好又有提供别种社会前途的新的政治思想出现的情况下，真正的变革才可打能来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动这场伟大变革、破那改朝换代的王朝循环的，是来自西方的冲击，其中也包括美国的冲击。

① 应为1911年。此处作者以清帝逊位为准。——中译本编者

西方的冲击

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在十八世纪晚期之前是非常稀少的。阿拉伯的商队偶尔勇敢地踏上人迹罕至的中亚细亚沙漠商道。十三世纪时，马可·波罗沿此路而来，返欧后，他记述了他这次前往神奇中国的旅行。至十七世纪早期，一批虔诚的耶稣会传教士说服了明朝的皇帝，允许他们在北京居住。在那儿，他们向中国人传授西方数学、天文学和兵器制造术，相对而言，宗教活动反而搞得不多。回到罗马方面，梵蒂冈各个竞争的修会之间的勾心斗角，使教皇转而反对这个传教团，因而至十七世纪晚期，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已所剩无几。

当然，中国并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环绕中国的许多亚洲小国承认中国权力和文化的至上性。这些国家被定期要求向中国派遣“贡使”，向皇帝献上贡礼和保证效忠。皇帝则以回赠礼物来酬劳进贡国。朝贡制度实际上可以视作一种贸易形式兼政治联盟。外国贡使必须向有身份的中国官员行一种礼节，即为我们知道的“叩头”。中国人既据有称雄东亚的权力，又怀有文化方面的优越感，于

是便将他们的国家和文明认成世界真正的中心。他们给自己国家起的名字，便典型地表明了他们的这种自负：中国即“中央之国”，代表着人类成就的中心。根据定义，中国以外的所有人都是野蛮人，他们必得接受中国文化，始能得到开化地位。

在耶稣会传教士离开中国之后，大批西方人重新回到中国沿海之前，过去了将近一百年，这一间隔标志着一段关键性的时间流逝，因为工商业革命于此期间已开始改变西欧和英属北美的面貌。新式的船只、优良的武器，而更为重要的是扩大对外贸易的新势头在西方处处开花。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更为重要的英国的探险者们，将各自帝国的边界进一步推入了亚洲。同中国贸易的可能性激发起不计其数的来华航行。甚至殖民地时期的费城，也享受到一份量虽小而利润丰厚的对华贸易的好处。1784年，几乎刚刚从英国手中赢得独立，美国商人就派出一艘船只前往中国。这艘船特地命名为“中国皇后”号。

无论中国农民大众如何贫穷，中国仍然有着吸引西方商人的堂皇的城市和异国情调的奢侈品。一位早期的美国航海家评论道，中国是“任何已知国度中最宏大、最富裕和最堂皇的。”这些话

出自阿马萨·德拉诺之口，他将他的家财和他对中国的着迷传给了他的外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①

尽管有着赢利的可能性，西方同中国的贸易却遭到种种严格限制。中国人墨守所有对外接触都必须通过朝贡制度的成规，只允许数目有限的外国商人，在广州口岸附近一处名叫黄埔的小村子里季节性地居住。外商只能在那儿与得到授权的十三个中国商人团体（“行”）做交易。中国人有意识地试图从各个方面来限制外来影响。这些限制证明对外国商人不便，不仅如此，对华贸易事实上的经济条件还处处使中国占上风。西方人购买各种昂贵的奢侈品，如丝绸、茶叶和瓷器等，而中国人从他们手中购买的只是少量的皮毛、檀香和人参——一种以充当催欲剂著称的药用草本植物。这种贸易的不平衡迫使英美商人以白银，而不是以商品来支付他们的大部分所购物，造成本国白银库存通过贸易途径不断外流。

因此，西方商人和他们的政府都希望修改中

^① 此处有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祖父是沃伦·德拉诺。阿马萨·德拉诺是沃伦的叔父。——中译本编者